



古史辨

第四册

---

顧頡剛編著

古史辨

第五冊

---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初版

甲種洋宣紙布面精裝本實價四元三角  
乙種洋宣紙紙面平裝本實價三元五角  
丙種瑞典紙紙面平裝本實價二元七角

# 古 史 辨

第 五 冊

編 著 者 顧 頡 剛

出 版 者 樸 社

總發行所 景 山 書 社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印 刷 者 引 得 校 印 所  
成府槐樹街三號

分 售 處 北平及各省各大書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古史辨》合訂本

- ① 第一册 顧頡剛編著
- 第二册 顧頡剛編著
- ② 第三册上 顧頡剛編著
- 第三册下 顧頡剛編著
- ③ 第四册 羅根澤編著
- ④ 第五册 顧頡剛編著
- ⑤ 第六册 羅根澤編著
- ⑥ 第七册上 呂思勉 童書業編著
- ⑦ 第七册中 呂思勉 童書業編著
- 第七册下 呂思勉 童書業編著

本書據樸社1935年版影印



黃帝初祖，德市于虞。  
 虞帝始祖，德市于新。  
 歲在大梁，龍集戊辰，  
 戊辰直定，天命有民。  
 據土德受，正號即真。  
 改正建丑，長壽隆崇。  
 同律度量衡，稽當前人。  
 龍在己巳，歲次實沈，  
 物班天下，萬國永遊。  
 子子孫孫，享傳億年。

—— 王 莽 律 度 量 衡 銘 辭 ——



新室國師嘉新公，戲侮造化如兒童。且爲於穆作

歌，新制，瓜分青天立五帝；五帝子爲天下王，終

造僞，始五德開義皇；增飾少昊閏趙政，新受漢禪

經，密，猶虞唐。若翁洪範五行傳，刺取春秋災異

緻而工。見。用譬父書兼譬經，爲其譏切王氏

寫以古文體隆。詭託書序自孔子，奪孔春秋子

隆。託之河間及魯史。『顛倒五經毀師法』，公

魯共。兼力造漢書，孫名言信有旨。神經怪諜中秘

一手掩羣矇。金絲發深，噓氣遂能摹古今：橫作

變怪，百代爭訂訕。校以尼山五里霧，填塞龍門

太史公，質實絕不同。奸破何處尋！

覆露，霾開日中。發得巢穴，

具告童蒙。

康長素先生(有爲)新學僞經考(卷四)重辭

節錄崔禪甫先生  
(適)史記探源

篇末繫詩

# 劉序

古史辨第五冊是專收近年來討論今古文問題同陰陽五行說起源的總集。

顧剛先生以爲我是好研

究這兩個問題的，在一年以前就要我作序。孰誤到現在，不能不交卷了，預備花上兩晚的工夫來寫一點年

來研究上古史的意見。近來同朋友們談話，凡是非研究上古史者對於研究上古史者每每一種很苛刻

的考語。他們不外是說：『研究上古史是猜謎。』或者說：『研究上古史者所得的結論沒有不對的，而同時

也就是沒有一個是對的。』諸如此類，簡直是有意同研究上古史者爲難。若把這些考語仔細校量一番，

只證明非研究上古史者的眼紅而已。說起來也真好笑，近十年中地底發現的新材料總是歸入上古史範

圍爲多。非研究上古史者看來，真有點不舒服。加以研究上古史者好提出問題，左是一個今古文經說，右

又是一個陰陽五行說起源，討論的討論，打架的打架，爭爭吵吵，鬧到不亦樂乎。非研究上古史者冷眼看着

真是垂涎三尺，不能不想一種對策，沒辦法，祇好挖苦一頓罷了。實在說起來，研究上古史者所解決的問題

有好多是有價值的。前如閻百詩，惠定宇之於僞古文尚書；近如王靜安師之考殷代先公先王，都是確切不

移，誰敢說一個不字？至於我們的工作，是秉承諸先生的遺教而擴充的，自信也有幾分成就，何至於等如猜

謎？本來研究上古史不是一件容易事，攏總祇有一點點材料，叫入引用起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外

行人看來真覺得目迷五色。但是這不能怪研究上古史的人不是。有許多上古史上的問題本來不能馬



上解決，務必有許多學者提出假設，然後因新材料而逐漸得到解決，這是做學問必經的階段。如果把所提出的假設作爲已解決的問題來看，自然覺得不能切理鬻心。至于評定假設，要看合理不合理；而估計解決的問題，那末要問可信不可信。這是我們考覈學問時必須的常識。

研究歷史同旁的科學不同，無論近世史或上古史，所留存的史料同已過去的史蹟相比自然不知相差多少倍。想在這些有限的史料中探求幾百乃至幾千年前的史蹟變遷，自然覺得捉襟而肘見。所以歷史家的論斷可以因偏以見全，因小以見大，這是歷史家應有的本領。而且歷史家不僅在考訂史料同論次史蹟兩方面下工夫，尤貴乎能有一貫的方法，作論史的骨幹。近來學者好言用唯物史觀來創造新史，這也是螳臂當車的想頭。馬克斯輩發現唯物史觀的時候所用的材料，不外乎西歐之部。如果拿來解析世界史總嫌不夠。說起世界史來，不論時間，空間，人口，材料四方面，用那一種做標準，都可以說中國史是佔第一位的。我們只可用人家研究歷史的方法來作參考，而最緊要的還是從中國歷史上自己鈎稽出一種歷史方法論來，那才是真正的辦法。我們即使承認唯物史觀是很有價值的歷史方法論，然決不是一種不可變動的金科玉律；補苴罅漏乃是後學者的責任，何況我們有那麼多的史料做後盾呢？而且馬克斯輩所發見的方法，其實都是社會學的而不是歷史學的。從前有一位學者拿一種比方來說明社會學的方法同歷史學的方法的不同。他說：社會學者的對象同歷史學者的對象是一樣的，好比同是一堆雜色玻璃片，紅的紅，綠的綠，黃的黃，顏色不一。社會學者把牠拿得來放在鍋爐子裏溶化了，變成一種混和的顏色。這就是說

社會學者對於材料的要求，祇取其共通現象而不顧牠的特殊之點。歷史學者就大不同了。他們把這一堆雜色玻璃片不放在鍋爐子裏，把牠放在棹子上，或者旁的地方，五顏六色，煞是好看。他們要就其自然的趨勢，擺布出各種的紋樣來。除掉土塊木屑不是真正的材料不要者以外，凡是玻璃決不肯放棄。假定其中缺少了一塊，也決不師心自用，無端捏造，但是不求共通現象。因為嚴格的說來，從古至今的史實就沒有是一件是相同的。如果司馬光資治通鑑把淝水之戰同赤壁之戰一樣的寫法，那就該打手掌心了。社會學者說歷史上的戰爭都是以經濟作背景，例如荒年之類。然而我又敢說，黃巢造反同洪楊之亂決不止一個原因。假定一位歷史家祇知道寫出黃巢造反同洪楊之亂的經濟背景，還不算希奇。最要的，還在寫出這兩件事中許多不同的原因。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歷史上的事實也是一樣。譬如寫一部小說，務必把其中人物的個性竭力描摹。如果曹雪芹作小說時，把薛寶釵同林黛玉寫成一鼻孔出氣，紅樓夢豈不是早該燒掉嗎。社會學者所以要求出社會的共通現象的緣故，是在推求以前社會所以變遷之故，同今後社會所以改進之道。從前中國沒有社會學，歷史家就兼這個差使。到了梁任公師作中國歷史研究法時還是說：『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廣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爲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鑑者也。』所謂『求得因果』、『以爲資鑑』都是社會學者的事。現在的歷史家不負這個責任了。我以爲研究歷史應該分兩層工作：第一步是考訂史料，純粹的是科學方法；第二步是論次史蹟，於是產生所謂歷史方法了。這種選擇史料和編比史料，是歷史家的專責。這種方法是接近于文學的。不過文學以想象成分居

多，而歷史家務必尊重事實罷了。所以歷史這樣東西，就是人類的故事。最要的是在敘述過去人類力量的表現，和各時代的特殊現象；及各民族的特性，和各民族間的相互關係。因此，歷史家不止看重客觀事實，同時還要有主觀的審擇同時代精神。而歷史方法之接近文學，就在乎此。再拿擺布雜色玻璃作比，雖然有顏色同數目的限制，而擺布者仍舊可以自出心裁，前後一貫，作出一種與眾不同的事業來。所以歷史家有了共同的歷史方法以外，還可以自創歷史哲學，也就是這個緣故。近年西洋歷史家不乏此類人物，求之中國，自漢以後很少人夠得上這種資格的。說到此地，可以言歸正傳了。

上古史的年代，嚴格說起來應該從商代直數到東漢末年。就其中再畫分三個時期：商代為一期，周初到戰國末年為一期，秦漢兩代為一期。就其中可靠之文獻言，前後不下千六百年左右。在這時期以前的歷史，除非考古學者今後在地底有更新的發現以外，我們實在再沒有勇氣來信從前人捏造的傳說。從康長素先生數到顧頡剛先生，所有的工作都是揭穿這些傳說的背景，惹得許多人對他們懷疑。到了現在，事實給我們的證明一天比一天多，康顧兩先生的功績是無可否認了。可以拿一種很簡單的現象來說：在詩書的時代，祇有夏禹的傳說；到了孔子的時代，就有了堯舜；到了戰國中葉以後才有黃帝，神農，伏羲；西漢初年，便有帝繫，姓中各種人物出現；到了東漢以後，如劉歆的世經，不知作者的易通卦驗，春秋元命苞，王符的五德志，志氏，皇甫謐的帝王世紀之類，時代拉得更古，名目也層出不窮。這樣的東西，分明是後人捏造的假歷史。假定現在有人提到盤古氏開天，學者們總不會相信吧？但是世本，同山海經上共有的蚩尤作兵伐黃

帝一句話，雖是我們隊裏的右翼健將書立先生，也要說：『蚩尤始制而黃帝效之』，像煞他老先生親眼看見似的。可見傳說出來越晚，時代拉得越早，而相信的人也越少。上古史的材料最麻煩的就是其中夾雜着傳說成分太多。我們知道詩書及易經中都夾雜着傳說，焉知金文及甲骨文中沒有很古很古的傳說在內呢？不過我們的知識還不夠認識這些傳說而已。詩書易以下的書，其中夾雜着許多傳說資料既是公認的事實，如果我們真想爲中國上古史謀出路的話，便應該下決心把這些傳說成分提鍊出來，然後真切正確的上古史纔會發現。光是一味雜湊，話雖說得暢快，恐怕距離事實太遠了。而且上古史中傳說成分的構成並不是枝枝節節的，這中間有他的歷史哲學在。我們如果真要研究這些傳說，非得求出他們造謠的用意和方法不可。說到這兒，不能不佩服康長素的偉績了。康老先生所做的孔子改制考，把孔墨以下幾位哲人的苦心孤詣和盤托出。他雖自命爲今文學家，但這種工作已經拆穿今文學家的西洋鏡而有餘了。至於他的新學僞經考，對古文家的陣地下一場總攻擊，更有價值。於是乎我們才知道自孔子以下直到劉歆，其間學者很少有幾個人沒有造過謠的。而且『現存的古書莫非漢人所編定，現存的古事莫不經漢人的排比；而漢代是一個通經致用的時代，爲謀他們應用的方便，常常不惜犧牲古書，古事，來遷就他自己，所以漢學是攪亂史蹟的大本營。』那末這種攪亂史蹟的根本方略如何呢？假定我們沒有考究出這種方略的眉目來，就很難分析這些混亂史蹟的底蘊了。顧頡剛先生在四年前作了一篇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這才知道漢人攪亂史蹟的根本方略原來是如此。這不能不佩服顧頡剛先生的心靈手敏了。在這方略

裏面，應該分兩層來討論：

### 第一，陰陽五行說起源。

### 第二，今古文經說之爭。

我覺得陰陽五行說的起源尤其重要，因為今古文之爭是拿這個問題作中心的。假定把陰陽五行說的起源和發展弄清楚了，今古文學的重心算是定了。兩漢學術界的大本營是札在儒家身上，然而兩漢的儒家決非春秋戰國時的儒家，他們原來是陰陽五行家同儒家的結合體。這派學者最初開創的是鄒衍，集大成的是董仲舒。洪範一篇，就是他們的重要經典。他們的力量在秦漢之間真有不可一世之概。像秦始皇，漢武帝，這樣雄才大略，都要上他們的當。秦始皇叫他們驅出去巡狩方嶽，因此死在路上。漢武帝聽從他們的話，巴巴的從陝西跑到山東去行那封禪之禮。而且他們還有一椿最大的本領，就是善變。他們看看儒家不得勢了，就會同旁的一家結合起來。在西漢初年黃老之學最盛的時候，他們也會同這一派人暗中鉤結作祟。你看太史公論六家要旨說：『道家因陰陽之大順，』又把陰陽家放在六家之首，似乎這位老學究也有一點褊心。到了後來，儒家離開民衆更遠了，他就真的鉤結起道家來，造成東漢以後的道教。其善變一至于此。你瞧是什麼緣故呢？事情說來甚爲簡單，就是中國人的宗教思想從中作怪罷了。凡是剛開化的民族，總是需要宗教來領導的。中國從古以來就沒有正式的宗教。而宗教上重要的力量，全靠信仰作背景。這種力量務必能統率知識階級同非知識階級才成，陰陽五行家在秦漢之間所以能大行者就

在乎此。因為陰陽五行家提出『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氣』種種名目，使一般民衆感覺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的畏懼；而同時一般學者又覺得這裏面也有談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道大經的哲學，如果不順他，便『無以爲天下綱紀』。因此兩得其便，就算他們的學說最時髦了！講到這裏，好譚唯物史觀的學者必定又說『慢來，還有——還有經濟的背景呢！』被這一問，下邊我就不敢亂說了，招待您細細推敲吧！陰陽五行學說在兩漢既然有這樣大的力量，而今古文之爭就因此起來。今古文之分，在骨子裏就因陰陽五行說之不同，復因此而產生政制及禮制的不同，然後產生經本同經說的不同。假定研究今古文而把捉不到這一點，決不會有解決的希望。七年以前，我在清華學校研究院讀書的那幾年，每當花晨月夕，同顏虛心侯芸圻兩位先生出來散步的時候，總時常談到今古文問題，時就想從洪範起，依次尙書大傳，春秋繁露，白虎通，漢書五行志，然後數到諸經的經本和經說，以及先秦諸子，漢代緯書，同史記漢書中各處提到陰陽五行問題的地方，都要把牠抽釋出來，下一番細工夫。那知畢業以後，爲稻粱之謀，奔走四方，就把這件事擱起來了。後來有一年暑假從天津回到北平，同吳子馨先生到燕京大學去訪顧頡剛先生。這是我第一次見顧先生，他一見便引爲同道，把他所做的工作都拿來給我瞧。我還記得其中有一件是把禮記月令拿來同夏小正，呂覽十二紀，逸周書時訓解，淮南子時則訓等列表作比較研究。這樣的工作雖然前人也沒有過，如同元吳澄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清曹仁虎的七十二候考，俞樾的七十二候考，羅以智的七十二候表，但是他們的眼光同方法遠不及顧先生。當時我就想到，我所要做的工作顧先生必定都已想到，

或許都已經做過。再過幾個月，我到河南去。顧先生遠道寄我一書，就是他的不朽大著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讀了之後，才知道今古文的問題已給顧先生捉住了重心，我們無論如何追不上了，祇好讓他獨步。於是我就轉向研究甲骨金文的路上去。

太史公作史記的時候，距離我們兩千多年。照理，他所看見的先秦史料應該比我們多得許多。然而大謬不然。除掉世本一書亡佚之外，太史公所用的材料，不外乎詩、書、國語、國策，及左傳中的材料。夏、殷本紀大概是根據世本作的，也許還有大宛傳、贊中所提到的禹本紀。此外太史公大概看見一些周代人作的譜牒，如所謂周譜，在秋歷譜牒之類，因此作出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這三篇大作來。至於周代初年的史事，除掉根據詩書兩種以外，就沒有多少了。平王以後，是根據國語以下諸書的。尤可怪者，自成康以後，直到東遷，幾百年間，史料異常貧乏。即使拿列國世家來說，凡是隱公元年以前的史實，幾乎篇篇一例簡單非凡。西周幾百年間留下的史料少到這般田地，其中必大有緣故。就是說東周以下的吧，史記所載也不外國語、國策，及左傳所記。假定一日不幸，把史記亡佚掉，我們也可以從國語以下諸書中鉤稽出大半來。戰國人所謂楚之檣杌、晉之乘，以及宋春秋、齊春秋、燕春秋、百國春秋之類，難道太史公都沒有看見嗎？真的就一點也不採用嗎？想必其中也別有道理。據我看來，西周之時就沒有寫定的史書。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也是後人瞎說。像尚書中大誥、洛誥、顧命之類，都是偶然留下來的一些公文書札。東周以後的學者把牠配搭起來，又雜湊上像盤庚、召誥一類東西，比較起來，在當時算是有系統的材料。孔子看

看旁的傳說比這一個更不行，於是乎很感慨的說：『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現在的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在孔子看來恐怕又是不雅之言了。——我想在孔子的時候，必定還有許多不雅之言，叫孔老先生瞧不起，而其中保存着許多好史料的東西在。從孔子直到太史公作史記，又是幾百年，我們中國人已經受孔老先生的教化好久了，所以太史公對於薦紳先生難言之的野史也不採用。不要說旁的，例如太史公所沒有見的竹書紀年，其中就有許多地方與史記不同，甚至其中有啟殺益的故事。雖然啓殺益的故事也不見得一定可信，但是可以想到現在上古史上的每樁事，在先秦必有好幾種傳說，例如萬章問孟子『伊尹以割烹要湯』之類。後來這些雜說被正統派一個一個的打倒，只留下現在人所看見的一派話。可見思想界上的權威真利害，他們可以不把真消息告訴我們，而同時還要叫我們看不見旁的假消息，光光的信他們一派人的胡說。由此說來，我們不是恨上古史上的傳說太多，却是恨上古史上的傳說太少了。西周以前的史料既然這樣缺乏，而我們所知道的又僅僅是秦漢以後的儒者們所傳的故事。說到東周以後的史事，也祇有在他們所承認的幾部書裏翻來覆去的輾轉傳述。那末我們研究上古史的人唯一的辦法，祇有向殷墟書契同兩周金文上開擴出新境地來了。中國的上古史要分兩方面做：一方面整理舊史中的系統；另一方面要從新得的材料中做成新史的骨幹。我以爲研究上古史的人應該作出兩部書來：

第一部

中國上古史引論。

第二部

中國上古史大綱。



整理舊史的系统，第一，要先把構成上古史底理論的宗派弄清楚。這件事有顧頡剛先生這篇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把底子也打好了；以後就是有補正他的地方，也很有限的。第二，要把舊史的年代世系弄清楚。這件事顧先生也已經幹得很好了；而且這步工作也非他莫辦的。顧剛先生前在燕京大學作的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甲編，就是絕好的典型。他在這講義的開頭就說：『這甲編是講中國上古史中的天子諸侯繼承的舊系统的，分爲上下兩部份：上一部份講夏以前的舊系統，下一部份講夏以後的舊系統。』這部講義把世系是講得很清楚了，年代是同世系連帶解決的，在他這講義上略爲補充，也算成功了。第三，要數到上古史傳說中的地域觀念了。這是一件很麻煩的事，裏面有好幾個系統。例如山海經，穆天子傳，同鄒衍的赤縣神州之談，都與正統派的傳說各不相謀。可見傳說中的地理觀念，還沒有經儒家來澄清一下子，所以有這樣的不同系統。就說正統派之中，堯典，禹貢，同漢書地理志的分野，也不相謀。對於古代地理的問題，顧頡剛，錢賓四兩位先生皆以全力對付。尤可佩服者，就是顧先生的州與嶽，同錢先生的三苗區域考。如果像這樣的文章多出來幾篇，古代地理的傳說系統也會弄明白的。第四，是上古史中的氏族觀念，這也是一個難題。左傳裏說到各國的姓氏，用地理來考校，大體都很合當的。其中惟有嬴姓之國太離奇了。秦是西方民族，同東方諸國習慣風俗都不相同。史記對於秦的姓氏有自相牴牾的地方。開頭說舜賜伯翳爲嬴姓；中間說『仲衍之後以佐殺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末了又說『秦之先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如果秦之先本爲嬴姓是真的話，那秦人非是東方民族不可，因爲江淮之間姓嬴的國太